

编前絮语

近代中国第一次出现“三农”问题，并成为—个“政治”层面上的重大社会问题，大概肇始于上个世纪初叶。“洋务运动”之后，外国人通过《马关条约》获得在中国大办工厂、广开商埠的权力，各地区尤其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型工商业城市，城市文化开始在中国兴起。但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却出现衰败之象——

教育方面：1905年科举废除，农村私塾迅速减少，农家子弟纷纷考入洋学堂，流入城市；乡村治理方面：迁延几千年的乡村治理结构被打破，—直以来的实际治理主体——作为农村精英和领袖的乡绅们——开始大批迁居城里，农村治安和公益系统开始瓦解；与此同时，随近代实业而兴起的商业高利贷加重了农业成本。在外国纺织品的挤压之下，棉桑等传统农副业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小农大批破产。

至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已是民生凋敝，满目疮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主体，开始了执著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从教农民识字开始，希望逐步地通过开启民智、发展民生、巩固民权方式，以改变中国乡土社会“愚”、“穷”、“弱”、“私”的顽疾。通过努力，晏阳初的实验地河北定县、梁漱溟的实验地山东邹平，成为名闻遐迩的中国“模范县”，他们的经验

被当时的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被更多的地方所接受。但是，随着“乡建运动”的发展，他们开始认识到，乡土社会痼疾难以解决，其由来更大程度上是专制体制所造成的，在很多方面，“乡建运动”逐渐地走向了以乡村自治、地方自治、推动宪政落实为主的社会重建的道路。但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其后改天换地的历史大浪，几乎彻底击碎了乡建运动知识分子的甜梦和努力。晏阳初漂泊海外，在印度、菲律宾的乡村继续推广曾在中国行之有效的“乡建运动”，改革开放后他被获准回旧地观光，已经老了的晏阳初通过高音喇叭冲着当年驻地村子说了句“兄弟姐妹们，我回来了”，就此老泪纵横不能成声。梁漱溟没有走，在“保留一个反面典型”的最高指示下，继续当了政协委员，文革中首都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上，老头子居然仍旧梗着脖子声明——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其“死不悔改”之状如此。去世之后，不进八宝山，也不回老家，按其遗愿，归葬于他当年的实验县山东邹平的山里头。

近代第一次“乡村危机”百年后，“合作化、公社化”的变革，使经过“土改”而获得短暂解放的中国乡村生产力，又遭受了一次打击，强制性的工农业“剪刀差”逐渐增大以至极限，农村经济重新“一穷二白”。改革开放后，实行“大包干”，废除人民公社，农村“土地经济”似乎开始“一包就灵”。其后，“乡镇企业”的出现以及城市经济的逐渐活跃，使工人、农民之外，产生了部分兼具两者特征的“民工”，这既是“专有名词”，也是“身份属性”，他们迅速成为“打工仔”，形成“民工潮”。但是，正如农民工的“城市边缘人”身份一样，改革二十余年来，农民、农村在快速转轨的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被彻底的“边缘化”。农民收入增幅下滑，农民利益屡遭侵占，农村公共品供给缺位，农村各种固有矛盾开始激化。“农民

苦，农村穷，农业弱”，虽然在村级自治、税费改革、延长承包等等政治经济对策不断推行的“政策利好”下，但“三农”问题仍然日益严峻。时光流转了近一个世纪后，乡村建设的历史课题再次摆到了人们面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虽然无论是选择“坐言”还是“起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作为去年选出的“CCTV2003年度十大经济人物”中的惟一一位学者，温铁军的选择“起行”，无疑更会使人讶异与感佩。说来巧，一百年前在河北定州翟城村，乡绅米鉴三、米迪刚父子在家乡搞“村治”，其内容与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计划非常合拍，晏阳初的实验于是首先就选在这个地方，并逐渐流风被于全国，且至今在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着影响。现在，翟城村的后人又选择了温铁军，邀请他出任设在村里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力尽所能地、无偿地出人、出钱，请他在这片“乡建”故地，做起“新乡建”实验。虽然温铁军的学术观点与晏阳初并不完全一致，但在行为选择上，他似乎很坚定地与上世纪的学者们走到了一起。

无庸讳言，温铁军现下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条件，甚至还不如晏阳初他们那时的充足，可他还是穿起大裤衩子跑到乡下，实打实地践行起他心目中新的“乡村建设”之路。这是分外难得的，但是，结果会怎样，不好说。第一，他的实验刚开始；第二，虽然时代变了，但他的实验仍然会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理论、实践上的风险和不可逾越的客观限制；第三，不少人认为，也有学者跟我讨论说，他的实验即便将来看起来成功了，在当下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也不会具有复制、推广的余地，那就没有多少价值。我跟这位同志说，即便确乎没有推广的价

值，就来做一个“标本的价值”，好不好呢？不是所有的事都会成为标本的，正如不是所有的理论都能被人记住和遵行的。能成为一个“标本”，让人看到这个事也可以这样做，不也很好吗？能放开手去真正做一件事，对一个不掌握公共权力、不拥有多少公共资源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也足够了吗？

在这本书里，我们想把这两个人所处的中国农村变革的时代背景、现实条件比较一下，也想比较这两位相隔近一个世纪的乡村建设者、乡村实验的倡导者，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这种比较，可能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理性地开展乡村建设，推进农村变革。比较之外，另一个方面的想法则是，学术和实践中的不同之处，本身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老实说，我想更需我们留意的是两代乡建学者的共同点，或曰薪火相传的那些东西——他们都认识到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他们都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平民立场，他们都主张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在行为上，他们希望改变比较传统的——从教科书式专家到奏折式“策士”——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进程的方式，他们更愿意通过亲力躬行而影响大众，从而最终也影响到决策，成为真正的“入世”的“公共知识分子”。

当然，建设性解决农村问题，我们仍在起步阶段。因为三农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交织在一起的问题。而且，时代不同了，我们不可能再去照抄晏阳初当年的一些具体做法，更要竭力避免在当时就遭人诟病的乡村建设中“造势大于实干”的偏差，从而使今日中国乡村建设跃上一个新台阶。

能编成此书，首先应该感谢新望先生，他以对“苏南模式”

的创见和深入研究而闻名学术界，这本书原本也是他已确定的一个研究项目，并做了全面的理论和资料准备工作，为勉励后学计，最终将项目交我来完成，成其功而不居其名，其风范如此。再者应感谢华夏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么一本书，使从晏先生到温先生这两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和践行者的思想、努力更广流传。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晏阳初先生和平教会在旧中国艰苦卓绝的乡村建设活动，前贤记录颇丰，但其中影像资料少之又少。此次成书，能搜集到如此之多的珍贵历史照片，全仗晏先生哲裔晏振东先生帮助，搜索家藏、辗转寻觅，由美国而菲律宾，始能达到如此之完整、全面，这是前所未有的。虽然因时隔近一世纪，很多照片已无法准确记录摄制年份，但诸多第一次面世的历史照片，在能带给读者更真切的直观感受而外，更将是今后晏阳初思想和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后学浅识，无从发明，以辑成前后两位乡建学者的思想为愿，但既涉“比较”，断章取义、疏漏不当之处难免仍多，其责在我，方家正之。

孟 雷

2004年9月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薪火相继的定县实验 /1

晏阳初：“定县，我的第二故乡” /2

温铁军：“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 /56

第二章

告语人民：晏阳初“乡建运动”辑论 /91

“乡建运动”影响中国 /94

走向国际化的“乡建运动” /131

第三章

世纪反思：温铁军看“乡土中国” /163

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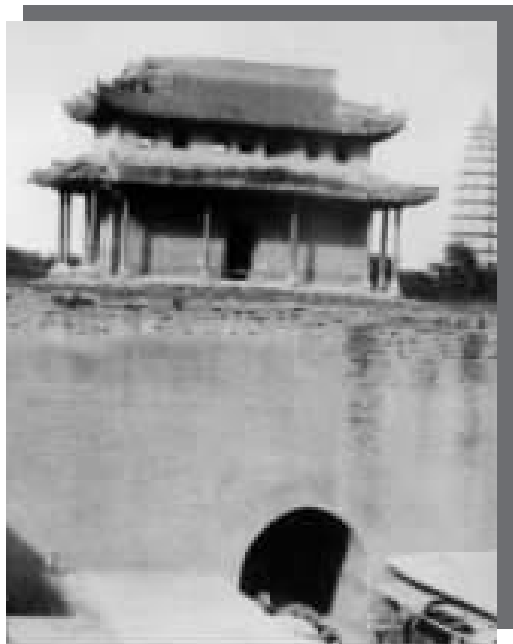
“市场失灵 + 政府失灵” /186

——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新时期“乡村建设”？ /220

第一章

薪火相继的定县实验



20 世纪 30 年代的定州老城

晏阳初：
「定县，我的第二故乡」
温铁军：
「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

当代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博士（1890~1990），祖籍四川巴中。1926年至1936年他率领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简称“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定州）搞了长达10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晏阳初：“定县，我的第二故乡”



晏阳初 (1890 ~ 1990)

当代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博士 (1890 ~ 1990)，祖籍四川巴中。1926 年至 1936 年他率领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简称“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定州）搞了长达 10 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他生前，无论是在国内和国际会议上，还是在饭后茶余的谈论中，都一往情深地把河北定县称为他的“第二故乡”。把这里的人民视为他的“亲友”和“兄弟姐妹”。

1985 年 9 月，晏阳初飞渡太平洋，从美国欣然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祖国，回到了他眷恋已久、当年搞平民教育的实验地定州。定州人民热情诚挚地欢迎晏阳初的到来。宾主谈古论今，那气氛，使人亲切地感到晏阳初和定州人民的深情厚谊。

晏阳初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1918 年夏，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天，即与当时留学海外的百名中国学生束装赴法国战场，参加青年会主持的为华工服务工作。他从代华工读写家信中深刻地认识到，被西洋人轻侮和蹂躏的华工“苦力”，并不愚笨粗鲁，只是因为贫穷和缺乏读书

机会而不识字，在他们身上蕴藏着极大的潜力。华工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和互帮互助精神，使晏阳初深受感动，便下定决心，立定回国后不做官，不发财，不为上层士大夫效力，一心为最贫穷的文盲同胞服务的志向。1920年，晏阳初回国后，先在北京发起组织“大众教育联合社”，1922年又在长沙兴办平民学校，提出“除文盲，做新民”的口号。当时毛泽东同志对此曾表示热烈支持并应聘为平民学校教师(注：《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10月14日第2版登此记载)。



在法国

1923年，晏阳初在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先后在华北、华中、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扫盲活动。1926年，晏阳初在平民教育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5%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平民教育的重点应转向农村。

为此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实验区，进行农业教育、农民研究和农村调查等主要工作。1929年，晏阳初举家迁居定县，平教会总机关与全体成员及家属也同时迁往定县。

当时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大学生、教授、学者和医务工作人员，为了探索一条用教育改造社会的道路，离开生活舒适的大都市，纷纷奔赴条件艰苦的农村，参加定县实验工作，一时间，



晏阳初一家在定县

形成了世人瞩目的“博士下乡”同农民为伍的新局面。

晏阳初和他领导的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的“四大”教育为手段，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进行和整体推行为特征，以铲除“愚、贫、弱、私”四大劣根提高大多数农民的“四力”，即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造就一代“新民”为奋斗目标。为此，晏阳初整整奋斗了八十余年。1985年他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之邀，临回国前他给定州人民寄来了自己的情真意切的谈话录音，他谈到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他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不坚固，国家是不会安宁的，这虽是几千年以来的话，但是这是一种真理，永久的不朽的真理，不因为时间过去而变化。‘民为邦本’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在世界上任何中西国家、中国以外的国家，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强国，人民是弱民的，没有的；也没有一个是富国穷民的。民强我们的国家才能强，民富我们的国



用农民看得懂的方式办教育

家才能富。看起来这很简单，真理却存在其中。我们今天要相信的就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我们应该努力的是固本的工作。”晏阳初说：“中国有金矿、煤矿，这矿那矿，但最重要的还要重视开发‘脑矿’，‘世界最大的脑矿在中国’，‘要充分发掘劳动人民的潜在力’，把十亿人民的脑矿开发出来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知识分子必须深入民间，到群众中去，‘博士下乡’，为广民众服务。”

晏阳初还提出了搞好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应该遵循的九大信条：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二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三要与平民打成一片；四向平民学习；五与平民共同商讨乡建工作；六不要坚持自己的成见，应当因时因地因人而施；七不迁就社会，应该赶上社会；八乡建是方法，发扬平民的潜在力，使他们自力更生；九言必行，行必果。这些都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闪光点，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晏阳初开创的平民教育，经过长达 11 年的“定县实验”，日臻完善。1937 年由于当时中国统治者的腐败和日寇的入侵，定县实验被迫中辍，但晏阳初博士的平教活动并未终止。他 70 年如一日，先后将定县平民教育经验推广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的乡村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43 年，晏阳初在纽约纪念“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纪念”大

会上，被国际学术界选为与爱因斯坦等并列的“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伟人”之一。神州大地的改革开放，为研究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和相互交流乡村改造的经验创造了条件。1985年和1986年，晏阳初先后两次访问故土。

他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发展与进步感到非常高兴。他激动地说，“我看到了中国的无限前途和希望”，“邓小平先生是扭转乾坤的人物，我很佩服他”。他联系自己七十余年在国内外从事乡村建设的经验，深刻地讲道：“中国农村建设工作做得实在是好，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的制度。”晏阳初博士是个诚实的人，他讲这番话是中肯的由衷之言，生动地体现了他对事业的科学态度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的精神。



与爱因斯坦一起被美国一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为
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

二

“平教总会”作出以定县为实验县的决定后，1926年10月，“平教总会”开始在定县设立办事处，划翟城附近以东亭为经济中心的52村为第一乡村社会区，旋因地方人士的要求，又增加10个村为62村。在“定县实验”准备时期，晏阳初即到定县翟城村国民小学任教一年，亲自做实地考察和生活体验，后因1928年5月赴美募捐而中辍。1929年，“总会”全部迁移定县，工作人员的眷属也都同往，晏的全家也于是年7月迁居定县。且工作人员陆续增加，到1935年时工作人员多达500余人。为使“总会”对于农民生活、农村社会的一般的与特殊的事实与问题有充分的了解与明了的认识，进而使后来各方面的工作有事实根据，首先要搞好科学的社会调查。展开社会调查的方



回国访问时，与老友梁漱溟(右)久别重逢



定县平教会会址原貌



20 世纪 30 年代的平教会所在地——河北省定县翟城村

法，鉴于农民对城市人下乡产生的种种疑虑，采取设平民学校。总会同仁都参加教育活动，分任调查、推行、编辑、教学、视导等各项工作，先和乡民发生师生关系，通过接触建立感情，沟通意见，在获得相当的信任后，再进行调查及农业改进的工作。1928年6月，“平教总会”设立统计调查处，聘请具有学术基础与实地调查经验的李景汉负责主持，配以得力工作人员，开始“以县单位作实验对象”的计划，在定县城区等地进行全县实况的调查。

一是社会调查。李景汉与统计调查处同仁张世文、诸葛龙在三四年间，走遍了许多村庄，克服了三次战争、地方水灾和瘟疫、农村经济凋敝以及人情相悖等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一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先后编辑成“定县社会概括调查”两册，于1932年秋刊行问世。“调查”包括：各村户的饮食起居、疾病死亡、农田农业和全县的宗教、风俗、政治、教育、工商、灾荒等。晏阳初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作了序文。他指出，定县社会调查，非为调查而调查，为的是知道农村生活的究竟，寻出生活上的问题，进而解决这些问题，即先求知道生活的依归，然后再规定教育实施方案。它是定县实验整个工作的指南针。

二是农村工业调查。中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国，但是乡村手工业仍是民间经济的主要成分，只是由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产品的东侵，使中国原有以自用为主的农村家庭手工业逐渐衰落，农村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农民生活愈加贫困。“平教总会”为推动生计教育，于1931年开始进行定县农村工业调查。这一调查分为：概括调查，即以村为单位，包括全县的453个村的状况；详细调查，即以家为单位，包括几种家庭工业集中的村庄；作坊工业的调查，包括定县城区及453个村。城区作坊以家为单位，453个村作坊以村为单位。调查工作由张世文主持，指导当地人负责进行。于1936年2月刊行“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内容有

纺织、编织、木工、铁工、化学、食品等 150 种不同的农村工业。它注重技术方面的研究，内有 100 余张照片，尤为珍贵。

三是多项专题调查。这些调查是：“定县借贷调查”、“定县选样人口调查”、“定县土地分配调查”、“研究区内集市调查”、“研究区内社会调查”、“研究区内家庭卫生调查”、“定县农民生活费调查”、“研究区内田场经营调查”和“研究区内猪、羊、鸡调查”等。其中尤以冯锐与刘拓、陆燮钧及美国人甘博等带领研究推广员，先后在翟城乡村社会区 12 个村和东亭乡村社会区 46 个村进行的农村生活调查最为详尽。它包括：历史与起源、地势及土壤、交通及转运、乡村组织、人口、教育、农业状况、卫生与疾病、社会风俗、庆会、娱乐、游戏、度量衡等。还查及各种农事：农产、畜产、果品、蔬菜、农具、施肥、树木及森林、农场内布置及农场房屋、轮种法、家庭工艺、特种作物耕作方法、农民借贷储蓄、农民买卖、农家周年出入境及农场经营盈亏等。

上述调查，尤社会调查反响最大，梁漱溟在主办广东乡治以前，特于 1929 年 2 月自粤北上参观，后发表“北游所见纪略”，公开赞扬“平教总会”扩充平民教育内容意义涵盖四大教育是一大进步；翟城村育才学校用意非常之好；社会调查确仔细而且得法；“表证农家”是很好的宣传推广方法。

三

文艺教育，就是以文学、艺术为工具，逐渐培养农民的文艺兴趣，使他们能在欣赏文艺时见到民族精神的伟大与无限前途；使他们取得现代的科学知识，适应现代的生活。“平教总会”计划：一方面以介绍文学与艺术为传播四大教育的工具；一方面研究并创造为大多数民众所需要的平民文学与平民艺术。为此，他



骑驴下乡